

信息与美国民主

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

〔美〕布鲁斯·宾伯◎著

刘钢等◎译

普赖斯奖获奖作品

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echn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丛书主编◎穆荣平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经典译丛

信息与美国民主

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

〔美〕布鲁斯·宾伯◎著
刘钢等◎译

普赖斯获奖作品

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echn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字：01-2008-5907 号

《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原名 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echn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作者为 Bruce Bimber, 该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sia)] 于 2003 年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发行其简体中文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 / (美) 宾伯 (Bimber, B.) 著；刘钢等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3-029442-5

I. ①信… II. ①宾…②刘… III. ①互联网络-影响-民主-研究-美国
IV. ①D771.209②TP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5988 号

责任编辑：胡升华 付 艳 黄承佳 / 责任校对：张小霞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编辑部电话：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B5 (720×1000)

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1/2

印数：1—4000 字数：370 000

定价：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内容简介

本书系布鲁斯·宾伯教授关于互联网对美国政治生活影响的首部著作。书中探讨了各利益集团、政党以及其他组织在互联网上博弈的具体运作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做的典型案例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作者认为，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的科层制度受到了严重冲击而进入后科层制管理模式。这种后科层治理模式无论是对传统的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作者提出任何技术进步都是与政治模式的改变相适应的，单单依靠技术不会改变政治格局。

本书适合研究政治作用于技术的学者以及有兴趣了解互联网对政治影响的人士阅读。

献给 劳拉

丛书序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经典译丛

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在其几十年发展历程中，融入了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到数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诸多学科的“营养”和睿智。发达国家在率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面对科技政策与管理实践的众多挑战，涌现出许多弥足珍贵的理论学说，产生了堪称琳琅满目的智慧果实。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些优秀成果，取其精华，集其大成，对繁荣和发展我国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的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坚持“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理念，要发挥在中国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火车头作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是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为特色的研究所和科学思想库。建所25年来，研究所秉承“志同气和，经世致用”的所训，致力于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和管理科学理论方法研究与应用实践，传播海外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领域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为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的学科建设做贡献。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经典译丛”，选择和翻译近年来得到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借鉴国外智慧尽一点绵薄

之力。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经典译丛”第一批推出的书目是5本科技政策领域“普赖斯奖”^①获奖论著，这些著作在国际科技政策研究领域都享有很高声誉，在科技政策研究方法论方面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韦斯特《数字政府：技术与公共领域绩效》详尽地分析了新技术如何促使政府改变对外界的反应，如何拓宽公众获取信息渠道，从而使政府绩效、决策程序和民主本身发生重大变化。伯纳尔《基因、贸易与管制：食品生物技术冲突的根源》对美国 and 欧盟在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全球贸易争端间进行了客观分析，揭示出美—欧食品生物技术政策冲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为进一步讨论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提供了全新视野。宾伯《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考察社会公众和政治组织如何基于政治目的而广泛使用互联网，完整地阐释了互联网对美国民主的深刻影响。莫基尔《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分析200多年来技术与科学知识增长如何成为全球经济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动力源泉，揭示了知识经济起源及其演化过程。古斯顿《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确保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率》以委托代理理论深入分析了战后美国政府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提出了政治家与科学家合作保障科研诚信与产出率的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范式。

传播学术新知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公益事业。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国际上得到赞赏和敬仰的经典名著，每一本都是学术精品，不仅包含了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而且有颇为复杂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译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译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也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们多加指正。今后，我们还将组织翻译其他经典著作，为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学科发展提供更多的有益借鉴。

在本译丛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科学出

^① 普赖斯奖 (Don K. Price Award) 由美国政治科学学会设立，每年评选出一本在过去三年内出版的科学技术政治学领域佳作。唐·普赖斯 (Don K. Price, 1910—1995) 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曾任美国全美科学促进会主席。

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顾淑林研究员为这一批译作高质量出版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指导性意见，在此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

穆荣平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经典译丛”主编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2010年10月

本书是 2003 年出版的，距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首次尝试性使用互联网与公众沟通，仅仅过去 10 多年。在这 10 多年中，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政治风景线的常规部分，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经济体以及许多人私生活的一道风景线。虽然互联网在 21 世纪初就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那时它对权力分配和市民政治生活的含义却远远没被弄清楚。

本书所介绍的是我的论证：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各种抽象和具体的政治组织业已适应在变革的机会和限制下，管理政治信息和通信。信息与通信的成本和分配中的变化并未持续发生，而是经历了长期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却被迅速的变革瞬间打破，其原因是技术的发展或经济的和社会制度上的复杂关系。信息革命使某些组织在政治市场上优于其他组织，这顺应了世界政治的潮流。

显而易见，在过去的 200 多年中，这些变革已经演进，但却不是发生在国家建制的组织层面。与信息革命相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各类组织和中介机构的结合部，在这个领域，它联系着迅速变革的社会中的个人与较缓慢演化的国家机构。互联网的兴起与政治组织顺应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环境变革。其间，在美国产生了第四代信息政体（information regime），它弱化了物质资源和管理某类政治行动的能力之间

的各种关系，并在信息与通信的丰富性中体现出其特征。

本书的意图是从信息与通信的视角来重新思考美国的政治史。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论证过：在互联网时代，从何种视角来理解政治是关键。我希望本书能反映出此视角，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19 世纪 30 年代、18 世纪 90 年代，或其他时期美国政治史中的政治。

自成书以来，出现了两项重要的进展。在技术世界和政治本身中，第一进展是新一代的互联网工具出现了，它迅速成为所谓的“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从 2003 年和 2004 年开始，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有了各式各样的新方法，其首要作用就是赋予人们创造和分配他们自己的信息、图像和其他内容的能力，围绕各种社会网络组建他们的通信和分享信息的网络——他们自己的网络，在各种网络之内它们是人们自己的网络。此进展之于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网络分层与个体市民之间的边界遭到破坏，另一个是大众传媒与政治组织的边界受到侵蚀。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通过社会网络的各种工具，它已触及不同地方的政治，如印度尼西亚、缅甸、丹麦和新西兰等国。在美国，社会网络中的公民与正式的政治组织之间的界限正在坍塌，而这种坍塌在奥巴马 2008 年总统选举获得成功后达到高峰，其特征便是强化和熟练运用技术，而这些东西在几年前根本就不存在。在当下的信息革命中，5 年或 10 年是个相当长久的时间。

自本书问世以来的第二个进展，涉及媒体和政治研究中的进步。在学术界，5 年甚或 10 年并非是一段长久的时间，尽管一直存在着许多数字媒体和政治方面的新工作。在美国以及欧洲的语境中，从某种程度上一个让许多人着迷的中心问题，就是互联网是否会有助于增加各种民主参与。在本书的第五章，我提到了若干可以追溯到 1998 年和 2000 年的很小的积极的效果，表明民主参与的可能性。本书的读者对这些发现进行了各种解读，他们将其作为利用互联网不能进行民主参与的反证。自本书出版之后，其他优秀学者的工作解开了这个谜题，而现在比较清楚的是，有些案例研究表明，介于使用互联网和进行民主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小型的积极联盟，这一点用人造的某种政治兴趣或研究者模型中其他

内生性问题，是无法解释通的。这一效果似乎集中体现在年轻一代，而且越来越清楚，政治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其他动机性的特征，在数字媒体的使用中相互作用——是我在本书中未能涉及的。

除了探讨民众参与率的问题之外，本书大部分的论证是关于美国政治和技术中的实际行动，它们以新的组织方式奠定了变革政治组织参与的基础，而非人们如何参与或不参与。我相信大部分论证能够站得住脚。社会性媒体革命如果没有加速本书所描绘的信息革命的进程的话，简直就令人匪夷所思。各种新的政治联盟的组织通过社会性媒体此消彼长，其焦点经常落在特殊的事件上，如各类抗议或政治决策等。同时，常设的正式组织也正在适应并采用新的策略。

自从《信息与美国民主》出版以来，我的研究工作继续关注这些方面的进展，特别强调组织和集体行动的链接方面。目前，我正与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同事弗拉纳金（Andrew Flanagin）和斯托尔（Cynthia Stohl）一起研究市民和政治组织中到底是谁在参与集体行动。我们将重点放在集体行动经验的两个关键维度，它们都受到了数字媒体的根本影响：人们的个人行动在什么程度上与其组群中的其他人互动；他们在政治组织决策中的声音究竟能有多大。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后科层政治时代，各种政治组织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的行为方式，以及市民如何体验它们的方式却发生着变化。

也是自2003年以来，全世界都对数字媒体和政治的关系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其是在欧洲和亚洲。对于中国内部和外部的观察者而言，互联网的未来在当今技术和政治中的各个方面，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基于这个原因，我特别高兴本书在中国有了中译本。政治中的技术在中国的道路与在美国的不一样，但我还是希望信息政体的理念，有助于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让他们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治与技术的关系，较之于对中国学术本身，它对中国的实践可能更有益处。

布鲁斯·宾伯

2010年2月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宾伯教授可以说是美国研究“社会性媒体”与政治关系的著名专家之一。这里所谓“社会性媒体”指的是互联网这种新兴起的媒体。它的出现为社会各个阶层都带来了崭新的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对政治治理的理解以及重新定义政治的含义方面都是意义深远的。

就学术背景而言，宾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生于1961年，并在加州的硅谷长大，后成为电气工程师。硅谷“当地的生意”最具特色的就是微电子产业。1983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获电器工程硕士学位，并获美国最古老的工程优等生联合会的表彰。毕业后，他先是在惠普公司干了几年，然后离开公司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1992年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他读博士的目的就是研究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最近宾伯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院做一年的驻地研究员。他从1994年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圣芭芭拉分校（UCSB）任教，1999年，又创建了信息技术与社会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宾伯正处于学术盛年，精力充沛，担任教职和管理职务也很多。2005年至今出任UCSB政治科学教授；2002年至今担任UCSB通信系的指导教师；2006年至今是UCSB信息技术与社会中心的荣誉创始主任和指导委员会委员；2006年至今他还担任UCSB驻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纳米技术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

宾伯的主要观点来自他的长篇重要专论——《马克思与技术决定论的三个面向》(*Karl Marx and the Three Faces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它最先在1990年刊于《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之后又于1994年被收入史密斯(Merritt R. Smith)和马克思(Leo Marx)编辑的文集《技术推动历史吗?》(*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该文于2008年再次被收入福赫(Rayvon Fouché)编辑的文集《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第一卷。这篇专论是宾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他研究技术与社会、与政治和公共关系的理论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所谓“技术决定政治”的观点表达为三种形式：第一，规范性表述(normative accounts)；第二，联合后果表述(united consequences accounts)；第三，逻辑后果表述(logical consequence accounts)。

宾伯认为规范性表述与文化相关，而联合后果表述则将技术视为没有预期的社会产出，这两种表述均不是决定论的。逻辑后果表述是自然的普遍规律，这一表述是决定论意义上的。可是根据宾伯分析，他将逻辑后果表述为在自然律的基础上对技术规则的实证描述；而规范性表述，则将文化和政治含义注入到技术概念中去了。宾伯认为，像艾吕尔(Jacques Ellul)、芒福德(Lewis Mumford)、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温纳(Langdon Winner)等人的观点，类似于他所谓的技术决定论的“规范性表述”。

关于技术的看法，如哈贝马斯在《通向一个理性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中认为，当技术自身的发展规范脱离了政治和伦理规范，效率和生产力这一目标统治着各种关于选择、意义和目标的讨论时，技术就可被视为具有了自动的、决定性的力量。宾伯说，虽然芒福德、马尔库塞和温纳本人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但他们的话语中常常隐含着技术进步是自动的、其影响是决定性的这类意思。所以有人认为，那些为技术的影响深表担忧的人往往也是技术决定论的信奉者，他们希望在增进人性的同时，将技术进步置于严格的监控之下。

可以看出，这个“规范性表述”的技术决定论中的“技术”，指的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规范或思维定式，具体地说就是一种技术理性或所有行

动以效率和生产力为中心，人们的所思所欲促成了技术社会的诞生。与规范性表述很不一样，“逻辑后果表述”和分析哲学眼中的世界图景比较相似。哲学家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如此定义决定论：当过去和自然法则给定之后，未来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么技术决定论就是，一旦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及自然法则给定之后，社会变化的方向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在这样的表述中，技术指的是机器和其他技术器械，这股独立的社会动因与文化因素无关，不管人类的价值判断如何，技术社会都必将诞生。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制度、社会交往和个人行为，都是技术塑造的，而人的特性和社会安排被视为第二位的因素。

不同于前两种表述，第三种形式并不关注技术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其着重点在于，技术后果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决定论”。宾伯提到，柯亨（Gerald A. Cohen）认为技术决定论有两个定义标准：它必须是决定论的，也必须是技术的，即一方面历史是由物理和生物条件决定的，而非由人类意志决定的；另一方面，技术在过去决定未来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必要因素。在这里，技术指人造物（artifact），而撇开了技术知识、技术过程及组织和控制等内容，因为这都是些重要的社会特征。只有把技术和社会因素截然分开，才能充分展示其决定论的特征。宾伯分析认为，依柯亨的两个标准，在他所列的三种表述中，只有“逻辑后果表述”才是真正技术决定论。

宾伯也知道，真正符合“逻辑后果表述”的技术决定论几乎就不存在，因为它把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及技术的自主性推到一个极端的状态。按这种分析，技术决定论就是一个没有存在价值的概念。经过宾伯的分类和辨析，规范性表述和联合后果表述这两种阐述技术角色的理论就不会受到技术决定论的混淆和干扰了。既然如此，可以看出宾伯的基本理念倾向于将描述性的“逻辑后果表述”确立为技术决定论，这样就必然把文化和政治含义注入技术概念中。因此，他的关于技术决定政治的理念更加注重文化等非技术的因素。例如，他的著作《信息与美国民主》就是一本论述文化、政治如何左右技术的代表作。

《信息与美国民主》是他的一部代表作，先后被译成阿拉伯文（2006年）、韩文（2007年）和中文（2010年）。除此之外，他于2003年还撰

写过《在线竞选：美国选举中的互联网》（*Campaigning Online: The Internet in U. S. Elections*）以及1996年的《专业知识在国会里的政治运作：技术评估办公室的兴衰》（*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in Congre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除了著作之外，他还撰写了许多关于互联网与政治的文章，如“互联网与政治动员：1996年选举季节的研究纪要”（Internet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Research Note on 1996 Election Season）、“互联网与政治变革：平民、团体与加速的多元主义”（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opulism, Community and Accelerated Pluralism）、“互联网与市民和政府的交流：媒体起作用吗？”（The Internet and Citizen Communication with Government: Does Media Matter?）、“互联网与政治：正在出现的前景”（The Internet and Politics: Emerging Perspectives）、“再论互联网与政治变革”（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Revisited）以及“互联网与政治的碎片化”（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Fragmentation）等一系列文章。同时他还写了若干其他网络社会的分析和实证的论文。

美国各大基金会、公司以及个人对他在互联网方面的开拓性工作慷慨解囊，宾伯自从于1996年在UCSB创办信息技术与社会中心以来，就先后受到NSF、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Dialogic Corporation、Carnegie Corporation、Canadian Pacific, Ltd.、Pew Charitable Trust、Outhink Corporation、Andrew Mellon Foundation等相当大的款项的资助。由于杰出的工作，他所获的奖项也是相当多的，其中《信息与美国民主》就获得2004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科学、技术、环境学部颁发的普赖斯最佳图书奖（Don K. Price Award）。此外还有多项由国际通信协会以及其他机构颁发的奖。宾伯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担任若干重要刊物的编委和评委，并在其他大学兼有教职。闲暇之余，他喜欢到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山脉登山或莫哈韦沙漠露营。

刘 钢

2010年7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A 致谢 ACKNOWLEDGMENTS

本书缘起于研究和教学的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是现代大学的首要特征。几年前，一位选修我开设的关于技术与政治课的学生提交了一篇出色的学期报告，在报告中她讨论了互联网与政治平等这一新主题。早在 1995 年，我已经完成该课程的设计工作。当时，互联网对我的冲击与很多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其他社会技术没有什么不同，这些技术包括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遗传工程、产业竞争力和军转民技术等。那位学生的论文虽然没有对我课程中涉及的内容一一探究，但却促使我进一步地思考这个主题，最终促使我开始了就美国民主中技术和信息问题而进行的理论研究。本书就是这项研究的成果。虽然我没有延续那位撰写论文的学生的思路，但我要对她给予我进行研究的灵感表示感谢。

xiii

学习商业史的学生会记得 1995 年，那一年网景通信公司 (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宣布其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那次股票发行也许是互联网从一个功能有限、政府资助、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商业行为，演进到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最醒目的标志。虽然我在网景公司公开募股的第一天做了一点小投资，赚到了很大一笔钱，但是，我不会作为一个技术拥趸者而著书立说。我的态度是基于怀疑派的乐观主义立场，把技术看成是改变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力

量，看成是创造财富的一种力量。我在现在被称为“硅谷”（Silicon Valley）的地方长大，高中毕业后我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并获得了电气工程的学士学位。20 世纪 80 年代初，掌握半导体线路设计有点像学会了拉丁文。拉丁文虽说与当代的会话和语言不是毫无关系，但在大街上靠拉丁文远远不足以交流。我的这一经历使我对技术驱动各种社会和政治变革产生了持久的兴趣。近些年来我对信息技术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来自我对技术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联系的兴趣。

一般的学术著作要感谢别人的帮助，很有代表性的做法是按照专业同事、学生与助手、家庭的特定顺序，一一致谢。但我却不想遵循这个传统。在构思这本书和后续的写作过程中，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伙伴和妻子——劳拉·曼库索（Laura Mancuso）。她的支持不仅仅表现在当我趴在计算机前数小时的时候，她仍然保持着作为妻子的宽容，并且用她那专业的智慧给我提出理性的建议；同时她也是一位真正的生活伴侣，是她给予了我学术写作和研究探索鼎力支持并帮助我获得终生教职。我对她有着最深厚的感激之情，我要首先感谢她。

我也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引导我成为工程师，然后又在我读研究生并成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时给予我无条件支持。我写作本书和进行研究时，还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 A. 希尔德豪斯（Arnold Schildhaus）和 J. 穆斯塔德（Judith Mustard）以及整个布洛伊勒斯-冈萨雷斯（Broyles-González）家族：尤兰达（Yolanda）、埃思莫拉尔达（Esmeralda）、弗朗西斯（Francisco）兄弟。

在学术圈里，我非常感谢两位学问大家，他们是密执安大学的 W. 纽曼（W. Russell Neuman）和现在在盖洛普公司（Gallup Organization）工作的 J. 科恩（Jessica Korn）。1999 年，罗斯（Russ）鼓励我继续推进这项研究并着手撰写书稿，当时这本书已经酝酿很久，但有人告诫我不要匆匆完工。他后来在许多关键点上又向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忠告和鼓励。杰西卡（Jessica）在一个与本书相关的写作项目上与我有过合作，帮助我形成了第二章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在有关联邦党人理论的素材方面。

在与本书相关的研究项目上，不少人作为研究助理和我进行过合作，